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從隋煬帝創行科舉制度後，數千年來的中國人無論在任官抑或是社會地位上都深受考試制度的左右，台灣地區自民國四十三年以來所實施的大學聯招制度即是科舉選才精神的延伸。另一方面，由於我國歷史悠久，遠非一般國家所能匹及，且長期以來，由於政府特殊的政治立場，使得歷史教育的發展一向為我國各級學校所重視，不僅政治力與社會力常伴隨其間外，台灣對於歷史教育的推動，更以考試作為強化的基本原則。因此根據本文對戰後我國大學入學制度與高中歷史教學變遷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有以下四點：

一、民國 43 至 93 年間，大學聯招制度與招生機構歷經了三個階段的改革，而考試方式與科目上也歷經了兩次的轉變，然皆可從其中看出政府由嚴格控管至權力下放的尊重多元自主精神。

台灣地區自民國四十三年以來即實施大學聯招制度，第一階段大專聯招時期，其目的為實踐政治目的，所以實施高中畢業會考與文武大專院校聯招；第二階段大學聯招時期，統籌發展大學教育，並研擬實施新制大學聯招；第三階段為大學多元入學時期，廢止長達四十八年的大學聯招，改由甄選入學與考試分發等兩階段考試入學，使得學生能有更多元的選擇機會。在招生機構上則有三次轉變，第一次為大專聯招會，奉令辦理當年度試務工作；第二次為教育部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明確由國家監督管理大學聯招事宜；第三次為大學聯招會，以核定聯招工作計畫，並委託大考中心辦理入學考試，至於大學招生策進會則為各大學招生決策機構。考試方式與科目則歷經兩次改變，第一次為大專聯考，以統一命題考試控制高中教育內容。第二次是學科能力測驗與大學指定項目甄試，用以評量學生基本能力與發展潛能，藉著考試方式的多元鼓勵考生發揮個人創意與獨特見解。

二、聯合招生時期，歷史教學的目標訂定以認知的層面為主體；多元入學時期的教學目標則認知、情意、技能的層次皆有，但仍以認知層面為多，且情意及技能的教學理念並未很具體化的被實現。另外，教科書的編訂與考試的實行皆需依賴課程標準中的教材大綱實施，然其未盡詳細，因此導致今日高中師生在面對考試時的無助與恐慌。因此教考目標一致，這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教育目標是決定教材大綱的先決條件，教材大綱則又規範教科書的內涵，故歷史教育目標與教材大綱的釐定實為歷史教育的關鍵。自政府遷台後，課程標準的修訂大凡有五次：民國四十一年、五十一年、六十年這三次的歷史科課程標準

目標幾乎完全相同，民國七十二年的歷史教育目標內容也極為相似，唯一增加的僅是將中國文化史目標另行陳述，此四次的內容皆以「明瞭」作為開頭，若依照布魯姆的分類法加以分析，顯見其全屬於認知領域，可見早期台灣高中歷史教育是強調史實的灌輸，而未指出培養觀察、判斷、思考等能力。這種情況到民國八十四年修訂的課程標準才大有改善。民國八十四年的歷史教學目標改用「啓發」、「引導」及「培養」等較知性的詞彙，因此頗能符合認知、情意、技能三領域兼顧的理想，但整體而言仍以認知層次的項目較多。

另外，就歷史教育目標的內容而言，民國四十一年至七十二年高中歷史科課程標準，主要是在培養民族的思維下，強調復興民族及對國際的態度與責任，重視歷史知識的傳授與情意的陶冶。其四項目標均以「明瞭」二字開頭加以陳述，推知課程目標是要學生接受完整、妥善的知識。相較之下，民國八十四年所公佈的課程標準，除了強調國家認同與社會責任外，其與昔日課程目標最大差異即在提出：「引導學生了解歷史知識的特質，使其認清歷史變遷對時代的重要性，以強化其思考與分析能力。」唯課程標準雖明白標舉「強化思考與分析能力」的目標，但對於能力的內涵和層次，以及如何強化能力，並未加以界定和說明。要言之，不論新舊版的課程標準，其所擬定的歷史科教材綱要均顯得較為寬鬆，缺乏明確的規範。¹

最後就評鑑而言，高中課程標準既是高中教學的準則，亦是大學入學考試命題範圍的依據。因此，在教科書開放編寫的模式下，不論教學或考試，基本上都是依據課程標準而來，即教學和考試的重點皆在「綱」而不在「本」。但是我們的歷史科課程標準相對顯得較為單薄且模糊，其一方面缺乏對能力指標的界定，另一方面也欠缺對教材內容的明確規範，如此不但加深了高中師生對考試內容的不確定感，同時也提供了考試內容成為教學綱領的機會，而使「考試領導教學」的現象更形深化。其所帶來的隱憂則是教考目標不一，聯考成績低落；測驗目標不清，命題理念不一；教考重點不同、多選內容繁雜；字數增多，答題時間的不足；消去法的作答方式是否恰當；偏本、超本的現象出現等。因此使得高中教師不但要傳授觀念，還要教導學生「找線索」；學生們不但要勤學苦讀，還要精於解題，而所得成績卻往往不能與付出的努力成正比，從而更加深了學生的挫折感，此現象可從近年來補習界歷史專科班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置中，看出學生的恐慌及家長的疑懼。

三、教科書的內容方面，由過去「大中國」的思維方式轉變為臺灣主體化。教科書章節中有關臺灣的敘述增加，而民國七十二年開始，「反共復國」已不再是強化的主體，教科書在內容的編寫上，取材較為中肯，立場也由過去「黨國體制」下以國民黨為敘述的主體，開始轉趨中立化，最後由於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章節在民國七十二年的編修中遠較前述三次為多，因此我們可以說

¹ 管美蓉，〈當前高中歷史教學與考試的困境—兼論教科書開放編寫後的命題構想〉，《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第十一卷六期，民國90年4月。

民國七〇年代的教科書「泛政治化」的傾向轉趨淡薄，而政治光環的色彩也逐漸趨於褪色。而多元入學時期更以臺灣作為主體，取代以往以中國為主體的思考模式，反共抗俄不再被強化，人物的選擇也脫離了政治的藩籬，這些都是多元化展現的實例。

民國三十八年底政府播遷來台，為了強化其統治的合理合法性，故極力從教育上著手，以培育學子民族精神與愛國情操，希冀能記取教訓，展開復國的新契機。因此自民國三十八年以後，無論在中學的教科書中以及國家選才的考試制度上，都呈現了明顯的「黨國一體」與「威權統治」，所以政治宣傳的色彩濃厚。而從民國七〇年代開始，由於兩岸政局轉趨穩定與緩和，加以後蔣經國時代政治社會的日漸開放，以及本土化的呼聲日益高漲，因此在教科書敘述選材的角度上才又開始有了轉變。從民國四〇至七〇年代的聯合招生時期，歷史教科書歷經了四次的編修過程，前三次大體內容相襲，只是稍作修改，而民國七十二年的修訂，則有較大幅度的改訂。改變的是，由過去「大中國」的思維方式轉變為臺灣主體化。在略古詳今以及台灣本土意識提昇的原則下，教科書章節中有關臺灣的敘述增加，台灣現代史上的領導人物，也開始出現在教科書中。另外，民國四十一年、五十一年以及六十年課程標準的修訂，「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一直是政府強化的重點，課文大篇幅的撰寫蘇俄的侵略以及中共如何禍國，讓學子能有鮮明的敵對立場，藉此培養愛國情操；而民國七十二年開始，由於整個內外時局的變遷，兩岸情勢的趨於和緩，「反共復國」已不再是強化的主體，教科書在內容的編寫上，取材較為中肯，立場也由過去「黨國體制」下以國民黨為敘述的主體，開始轉趨中立化，許多過去所未曾提及的事項，如中共的人物、二二八事變等都相繼出現在此時的課文中，對於歷史人物的道德批判，程度也趨於減緩。最後由於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章節在民國七十二年的編修中遠較前述三次為多，因此我們可以說民國七〇年代的教科書「泛政治化」的傾向轉趨淡薄，而政治光環的色彩也逐漸趨於褪色。

而多元入學時期的高中歷史教科書與此階段的大學入學方案一樣，皆呈現了多元化的色彩。民國 72 年統編本教科書雖已較前階段來得開放與政治色彩降低，但是若與 84 年審定本教科書相比，審定本教科書無論在章節選材上呈現多樣化，如以專題方式書寫，以及草原游牧民族單獨成章等；再者就編寫方式而言，更展現了其特殊吸引人之處，如教科書編排色彩鮮明，圖文並茂，而且龍騰版更以故事化的方式來呈現一大時代的面貌，學生有如在閱讀故事書一般容易上手，可是缺點就是內容引人入勝但卻不知重點為何，在當今考試領導教學的時代背景下，學生如果上課不專心抑或歸納分析能力欠佳者，根本無法勝任。此外以臺灣作為主體，取代以往以中國為主體的思考模式，反共抗俄不再被強化，人物的選擇也脫離了政治的藩籬，政治及軍事史的份量減少，社會、經濟、學術等內容則明顯增多，這些都是此時期多元化展現的實例。

四、在教學方法上，無論是聯合招生時期抑或是多元入學時期，偏重講述的教學

法皆為主要的講學方式。原因無他，在龐大的考試壓力，以及家長、校方的關注下，教師不敢有所更張。而在歷史課程的進行上，無論在聯合招生時期或是多元入學時期歷史課程標準中所希望達到的鑑往知來以及啓發學生思想的目標，似乎並沒有達成。大部分的學生仍然認為歷史是一個聽故事的學科，且認為歷史只是應付聯考的工具，顯見此時在考試領導教學的結果下，學科本身的意義被抹滅，只是考試工具下的一個附庸而已。

在高中歷史教學的進行上，聯合招生時期無論在課程標準中對於教學法的討論，以及王仲孚、王德昭以及李符桐教授們對歷史教學法的主張，當然還有實際從訪談及問卷中所得知的教學情況，都可以明顯揭櫫一個事實，就是多元化的教學（包含教學媒體、教學法的運用）理想在此時期，並沒有被落實。究其原因，此時期所倡議的教學法，皆較著重於歷史基礎知識的累積需靠記憶，地名、人名、時間等乃是歷史之骨幹、公式，是學好歷史的關鍵。此外，講授法仍是此時期側重的焦點，亦即注入式的教學法，其他各法在此時期，並未受到重視，原因固然為學校設備之不足，但最大之原因仍為教師之因襲未改，且配合聯考的實施，教師在成績及家長的龐大壓力下，未敢有所更張。另外就歷史課的進行而言，學生多半希望歷史課是快樂、活潑、聽故事以及無須背誦的課程，雖然理想與事實並不完全相符，但是學生對於高中歷史課程的進行仍感滿意，原因在於歷史課在此階段只不過被認為是聯考下的一個科目，在考試領導教學的模式下，老師的要求符合了學生的需求—即求取高分，因此國立編譯館版本的內容儘管繁多，但是此時期的學生仍以它作為學習的主體，並認為歷史的學習以此就足夠了，由此在在都可看出，此時期的教學仍籠罩在龐大的升學壓力下，考試的需求，讓教師仍以灌輸注入的方式作為傳授的主體。而多元入學時期的歷史課程與聯合招生時期的教學模式仍然相近，儘管資訊融入教學已逐步在落實，儘管教改團體不斷的在呼籲、專家學者們也提出不同的見解，但是考試領導教學的模式還是在、講授法的教學仍為大部分教師所採用、還是經常在趕進度。

考試左右教學方法與教育內涵，是造成今日各高中歷史教學偏差的主因。我們可從一般高中之平時測驗、期中考、模擬考試，多模仿大學入學考試方式命題看出。因此用來考察教學效果的校內測驗，已隨著大學入學考試的方向走，可見考試領導教學，是不辯自明的。九十三年度的歷史科指考成績，嚴重的傷害了全國戰戰兢兢以準備歷史指考的莘莘學子，更對平常兢兢業業從事高中歷史教學的老師，對自我教學知能形成甚大的質疑，尤其在九月北區指考評鑑會上，許多高中歷史教師針對此亂象提出質疑，包括：考題缺乏評鑑力、試題出現偏重某版本、題目呈現在課程大綱上分配不均且考試內容偏重傳統政治、軍事類史實，且遠超出現今高中歷史教材等現象，但所得到大考中心與相關大學教授的回應是：出題教授已很努力的參考各版本高中歷史教材、高中歷史教師不適合介入大考試題作業等回應，也就是說：如何解決此「一綱多本」下的試題亂象，仍是沒有頭緒，故往後歷史科大考發展仍是充滿變數。

加上國中歷史教材不論教學內容與教學時數一直朝向簡化的趨勢發展，故國中畢業的學生原本歷史知識已是薄弱，一到高中面對「一綱多本」多元教材，又有史料題與情境題和遠超出課本內容的大考考題測驗，且高中歷史授課時數又將面臨縮減的危機，這些種種改變在缺乏配套措施下，必然一定嚴重傷害高中歷史教學品質，而負責教學評量的歷史科大考試題又往無從掌握的發展方向邁進，可以想見的是：高中歷史教育現已處在值得憂慮的危機中。如何讓高中歷史教育遠離此乖離的教學情境，進而步入教學與評量彼此相應的正軌？即究竟整個高中歷史教育問題應從何入手改良？這是身處歷史教學現場的高中教師責無旁貸的責任。以下即提出幾點建議，希冀能對當前的教育環境有所助益。

壹、對課程決策者的建議

一、盡速界定高中生應具備的重要歷史知識和能力。

專題式編寫的高中歷史新教材，其教材綱要與目次編排雖然彼此相近，但是在教材內容上卻有很大的差異。面對這些各版本的「大同小異」或是「小同大異」，教師與學生都對未來的考試方向、題型，感到茫然與惶恐。教育部與制定課程標準的先進們，開放教科書編寫，雖是順應多元化社會的需要，以及給予教師更多的自主權，但教材的歧異性太大，勢必造成命題委員的困擾，以及教師與學生的無所適從。所以要解決各版本差異過多過大的問題，應先由教育部與歷史專家學者商討，制定出在每一教材綱要下更細部的內容、名詞等，如此一來，更詳細、更具體的細節綱要，使各編者有了更明確的方向，同時入學考試、基本學力測驗等命題的困擾也會獲得解決。

二、加強國中歷史學科能力的培養，且教學時數不宜再縮減。

整體而言，新版國民中學社會領域中，歷史課程規劃的主要特質是內容小幅度精簡、授課時數大幅減少。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九年一貫國中學生的整體歷史程度勢必呈現更加下降的傾向。對於即將於九十四學年度以後進入高中就讀的新生而言，他們將面臨更沉重的學習困境；對於高中歷史教師而言，如何銜接國中與高中課程之間的巨大落差，甚至加深加廣、強化歷史思維與分析，都是更為艱鉅的教學挑戰。因此要落實高中專題化情境教育之前，須先加強國中的基礎教育，否則在其薄弱的基礎上，強硬的在高中教材中施以宏觀的意義，不但會流於走馬看花，且教學的品質與效果都是值得堪憂的。此外，如果九十五年的課程標準再度縮減高中歷史教學時數，那麼以現今本國史每星期 2.5 小時的授課時間，尚無法講完兩冊本國歷史；將來原本佔五分之四內容的本國史濃縮為二分之一，原佔五分之一的台灣史教材要擴充到二分之一，而且教學時數更減為每星期 2 小時，高中歷史教學的進行是否可能完成？值得深思。

貳、對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建議

一、建立歷史教學實務與大考命題的緊密互動²。

以高中的現狀而言，大考命題教授與高中歷史教學之間，似乎只有單向的給予與接受，而沒有雙方互相溝通的途徑，命題教授心中的高中歷史教學恐怕是想像者居多，卻少了對高中教學同情的理解。利用幾個小時的時間，找幾位高中教師到考試中心與教授座談，每位教師發言的時間不多，解決的問題也著實有限。應該讓參與命題相關的教授與研究人員，找機會多看看高中歷史課是怎樣進行的，看教師在課堂中怎樣將教科書的內容轉化給學生，體會教學過程師生經常面對的問題，瞭解一個歷史概念或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能在課堂上花多久時間講解、討論。高中歷史教學與考試並不是歷史研究的通俗呈現而已，它是一項專業，參與命題的人員當然要先深入了解高中教學的實際情況，才有可能命出一道反映教學成果的題目。

二、公佈大考非選擇題參考答案及評分標準，促進考試與教學的良性互動。

大學聯考各科不公布非選擇題參考答案以避免引起爭議的作法，已行之有年。證之中國大陸的高考或香港中學會考，均提供了參考答案及評分標準，以作為高中師生改進教學與命題的參考。開誠佈公的態度，是決定教學與考試能否齊步並進的關鍵。命題者應同時將題目與命題根據、命題理念、學生解答線索一併交出，並於考後公佈，最起碼要做到在特定的機制下接受公評，以便外界檢驗考題合理與否。考試既然主宰了教學活動，我們就應該要了解命題者的命題脈絡，要求命題資訊更加透明化。

三、舉辦命題研習會，以溝通命題理念及改進命題技術；且急需建立高中歷史教學與考試資訊網路，有效整合教學與考試之資源³。

由於教師所命製的試題直接提供了診斷教學的依據，其對學生的影響力，可能比大學聯考試題更具有影響力。為了使命題理念及命題技術得以溝通和改進，舉辦命題研習會，讓更多教師熟悉命題理念和原則，應是迫切而必要的。再者，授課負擔過於繁重的問題，一直困擾著高中歷史教師，為了使教學資源可藉助網路之便，達到整合及流通的目的，目前部分大學的歷史系已展開網路架設的工作，希望能夠透過網路，讓教學或考試資訊能快速流通，一方面可以讓教師之間的資訊和經驗傳遞更為有效率，一方面也可以藉此減輕城鄉差距的問題。

四、聯合各高中成立聯絡協商會以利於與大學的招聯會或考試的專責機構聯繫，協商與提出建言。

在大學入學制度的改革過程中，高中通常處在一個被動接受的地位，而學生

² 蔡蔚群，〈考試能否檢驗教學的成果〉，歷史教學新嘗試研討會，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民國93年9月，頁15。

³ 管美蓉，〈當前高中歷史教學與考試的困境—兼論教科書開放編寫後的命題構想〉，《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第十一卷六期，頁81。

在高中階段的訓練與學習，卻是為了進入大學所做的預備教育，因此高中與大學的關係可說是唇齒相依。高中若不了解多元入學方案的理念與做法，以及考招分離的用意與現況，在教學上可能會有所扭曲，或是難以有效的配合輔導學生選擇各種入學管道。再者，新方案上路，無論甄選入學制、考試分發入學制，以及測驗有關的學科能力測驗、指定科目考試、術科考試等，對於高中教育均會有很大的影響，而在執行或配合上不免會有一些缺失或是窒礙難行之處，因此高中也需要有一個聯合性的組織，以利於與大學的招聯會或考試的專責機構聯繫，協商與提出建言。考試領導教學誠不可諱言，因此命題確實會影響教學，而考後的試題分析以及評論，高中教師的聲音會顯得很重要，故宜有一固定的組織從事試題的評鑑與提出建言。

參、對招聯會和學校的建議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在實施初期，大學院校可能因訂定招生的方式與條件的不恰當而招生不理想，不如預期，為此建議招聯會應慎重的考慮補招生事宜，相信在事前先有縝密的規劃與宣導，要比事後的應急補救要適切的多。學校以及教育當局也應多加宣導多元入學的方案內容，與實施的原則，以減輕家長對於入學制度的疑慮。

「考試領導教學」的實施，如果有良善的目標與完整的配套措施，實質上對教學活動而言，是利多於弊的。但是若要達到此目的，技術層面的執行則至為關鍵。選擇題能否測驗出某一種或某一層次的學習能力？歷史學習成果能否透過選擇題加以檢測？問這些問題時我們必須先去確定：目前在課堂上進行的是哪一種教學？學生在歷史課得到了那些學習成果？培養了怎樣的學習能力？當然，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在不同老師、學生心中，不同的課堂上，教學可以有千百種不同的樣貌，沒有單獨一種教學型態。然而，看看我們每天面對的教學環境，如果一綱多本只是增加學習內容，帶來的痛苦比預期的教學解放來的多很多，因而興起了重返一綱一本的呼聲，如果各家書籍供應商紛紛打出供應國立編譯館的教材作為新教材使用，如果社會輿論深深期待歷史教育成為國家認同或民族精神培養的手段，如果我們的歷史課總是拼命的趕進度，如果上課時學生多半是吸收歷史而非動手、動腦筋的做歷史，如果參考書、測驗卷在學校如此的普及，如果記得許多基礎知識是教學的重要目標，整體而言，我們就很難相信台灣目前的教學是以培養學生歷史思維、學科能力為主的，⁴如果我們不斷的以公平、公正、公開作為訴求，那麼是否唯有重返統一教材、統一考試才符合社會大眾的要求呢？「公平」「公正」的真意又在哪裡呢？我想社會價值觀的再建立、轉變舊有的思考模式，才是教改成功與否的真正關鍵吧！

⁴ 同註 2，頁 3。